

李煥先生給我的啟發與指引

——為李錫公九秩大壽而作

（彩色圖照刊第二頁）

● 吳建國

（前國立高雄工專校長、現任蘇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名譽院長）

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二日，高齡八十九歲的前行政院長李煥（錫俊）

初次拜見備感溫馨

，在立委公子李慶華陪同下，專程到蘇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來看我。一見面，他高興的握著我的手說：「建國，真沒想到會在蘇州與你見面，不過我就是要來看你，為你能在大陸擔任校長，向你道賀！」

初次見李錫公是在一九七四年八

紙上寫下了《張景珩》的名字與電話號碼，吩咐我們到了三藩市，可打電話給張先生，他會提供我們必要的協助。因有李錫公的介紹，我到了舊金山以後，便主動與人稱《張大哥》的張景珩取得聯絡，並在他的全力支持下，開展了美西地區留學生的愛國活動，不僅豐富了我的留學生涯，最重要的是從張大哥身上，學習到真正服務的精神，對我日後工作應具備的正確心態，無論是從事教育，還是擔任民意代表，從事為民服務的工作，幫助都很大。因此建立我們之間長達三十餘年的感情，迄今不衰，彌足珍貴。

此話使我感動的熱淚盈眶，不知應說什麼，只能笨拙的說：「謝謝您多年來對晚輩的愛護與鼓勵！」三十多年來，錫公對我的照顧、教導與提攜，此刻也翻騰在我的腦海中，因為這些對我的影響既深且遠。

工程研究所獎學金，準備出國深造前夕。我與台大同學成樹芬小姐剛完成婚禮，家岳成公崇樁時任中國國民黨台中市黨部主任委員，正是當時在中央黨部擔任組織工作會主任李錫公的部屬。在家岳安排下，我與內子前往臺北中央黨部拜見，錫公親切的接待我們，詢問了我們出國留學的計劃。在知道我倆將往美國舊金山灣區的柏克萊加州大學深造後，他迅即在便條

（13）

赴美深造一年後，即一九七五年七月間，適值先總統蔣公崩逝不久，政府為加強海外留學生對國事的瞭解，利用暑假在臺北舉辦俗稱《小國建會》的《海外留學生工作研討會》，由教育部長蔣彥士，青輔會主委潘振球與救國團主任李煥三人具名邀請全球各地校園留學生團體負責同學與會。我因在柏克萊加州大學領導留學生愛國活動略具成效，亦忝為受邀者之一。在臺北開會的兩星期中，李錫公以召集人身份所作《政治建設報告》，最受所有留學生的歡迎。他的報告切中時弊，條理分明，且態度懇切，對一些敏感問題也毫不避諱。以致大家聽了入神，大呼『過癮』之餘，深覺意猶未盡。於是，在與會同學一致的要求下，李錫公只得再排一個晚上的時間，與大家促膝長談國家大事，直至半夜方才散會。這在一九七〇年代的臺灣政治氛圍中，政治人物是需

要相當勇氣與膽識，才敢如此開懷暢談國事。李錫公正是當時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是我第一次親身體驗李錫公身上自然散發令人難以抗拒的政治魅力，他的演講與報告深得蔣經國先生真傳，極易打動人心，也具有理性說服力。那時，是李錫公第一個事業的高峰，他同時身任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中央組工會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與中國青年救國團主任三大要職，是蔣經國先生最倚重與最信賴的幹部，承命負責執行所謂臺灣政治《本土化工程》中，最重要的人才發掘與組訓工作。許多日後在臺灣政壇扮演重要角色的知名人士，如李登輝、邱創煥、許水德、吳伯雄、黃昆輝等人，都是經由李錫公向蔣經國先生推薦，才受到重用，出任要職。而他傑出的表現與無私的操守，證明雖負重任，卻絕非浪得虛名，也證明經國先生的知人善任。

李錫公的國是報告，使我們這批海外留學生體認到當時臺灣上下一心，團結一致，全力推動《十大建設》，是社會充滿信心與希望的大時代，絲毫感受不到因老總統過世所帶來的任何負面影響，也粉碎了海外臺灣可能陷入《風雨飄搖》危局的謠言。自然，我會後回到金山灣區，也將這個重要的訊息，帶給了海外同學，增強了大家對臺灣前途的信心與對政府的向心，使日後的海外愛國活動日益蓬勃，並朝有利臺灣的方向發展。

其後三年，我在美忙於學業，一直沒有機會回台。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我通過柏克萊加大的博士口試，即將完成學業。是年五月，我決定攜家小返台探親。那時，適逢蔣經國當選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五月二十日在臺北國父紀念館舉行就職大典。我與內子受國民黨中央特邀，得以親臨會場，見證了臺灣正式進入《蔣經國時代》的一幕。典禮結束，在步出會場的時候，巧遇李錫公。此時，他正

失利，又發生了《中壢事件》，『奉命』承擔所有失敗的責任，辭去了三大主任要職，轉任屬於《閑差》的中國電視公司董事長職務，也是當時臺灣一些政論雜誌以《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來形容李錫公所處事業低潮與挫折困境的時期。不過，他仍然親切的與我們談話，神色自若，絲毫看不出任何失意的表情。在知道我即將完成博士學位的訊息後，他面露喜悅的向我道賀，並鼓勵我繼續留在美國工作一段時間，累積更多的經驗後，將來有適當的機會再返台服務。

又過了一年，一九七九年七月，政府為因應年初與美國斷交的變局，決定擴大舉辦《國家建設研究會》，並特別增設《政治外交組》，廣邀海外學人，齊聚臺北，共議國事。我應邀與會，參與《政治外交組》的討論。此時臺灣朝野望治心切，尤盼政府能全力推動《政治革新》，以符主客觀形勢的要求與面對未來的挑戰。而

臺灣那時尚處戒嚴時期，許多敏感的政治議題，均不得公開碰觸與討論。《國建會》的適時召開，成為輿論界高度期盼，由海外學人帶頭，突破諸多《言論禁忌》的希望所在。在這方面，我與高資敏兄及巫和怡兄每能言人所不敢言，因此被臺北新聞界封為「海外三劍客」，與國內主張《革新保台》的開明學者沈君山、楊國樞、胡佛等多位教授相互呼應，使得此次國建會成果格外豐碩，受到輿論界高度的重視與評價。

追隨籌辦中山大學

或許從報章上看到我參加國建會的新聞報導，李錫公特地在國建會後，邀請我與內子到中國電視公司貴賓室餐敘。同時告訴我，經國先生已告知他，即將出任國立中山大學在高雄建校的籌備處主任。他誠懇的說：

「建國，這是一個艱巨的工作。尤其，現在國家處境如此困難，海外

人才都不願意返台服務，你一定要幫我。」

就這麼一句話，打動了我的心，我毫不思索的表示會全力以赴，協助他為臺灣辦一所一流的大學。

回到美國後，我開始與李錫公保持較密切的書信往返。從他的來信中，得悉中山大學建校工作開展的點點滴滴。那時，我與內子均在加州矽谷高科技半導體公司上班，收入豐厚，又擁有一座附有游泳池的大房子。本來我們繼續長期居美，有如老一輩的留學生與大多同學一樣，去追求實現個人的《美國夢》實屬理所當然。可是想到日漸年邁的雙親與苦難的臺灣，心中總有一分割捨不去的親情與感情。尤其，當時臺灣雖正處外交逆境，但是在蔣經國總統睿智的領導下，已顯現否極泰來的契機。我已能預見，一九八〇年代將是臺灣發展重要的一個轉捩點。抱著一分知識分子的責任感與使命感，我決定放棄在美發展

的機會，返台服務。我的想法，得到內子無保留的認同與支持。於是，我們開始做回台的準備。

正當我心意已決，並積極變賣房產，東裝返台之際，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晚，我突然接到李錫公的越洋電話，告訴我中山大學即將在七月

一日正式成立，他已被教育部任命為首任校長。由於這是過去十餘年中，政府在台新設的唯一一所大學，各方

對中山大學因此期待頗高。在當年的大學聯考中，中山大學雖然首度參加招生，但是選擇中山大學做第一志願

的考生人數，僅次於臺灣大學。這是臺灣教育史上從未有的事，使他愈發覺得責任重大，不能辜負社會、學生與家長對中山大學的厚望。可是，學校即將成立，第一年招生的中文、外文、企管與電機四個系中，唯有電機系主任還沒有找到適當人選出任。李

錫公因此想到了我，他在電話中說：

「建國，我知道你不是學電機工

程的，不過沒有關係，大學一年級大都是基礎課程，你先回來，暫時代理一年的電機系主任，同時為中山大學籌備成立材料科學研究所。我也可以利用未來一年的時間，找一位合適的電機系主任。」

那時儘管我多麼錯愕，可是李錫公已做了決定，不容我推辭。因為我若推辭了，問題就又回到李錫公身上。在那個台美外交甫斷之際，要從美國找一位學有所成、屬最熱門專業的電機博士返台任教，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與李錫公通過電話的一個星期後，我辭去了美國公司的工作，回到了臺灣，來到了西子灣邊的中山大學，在李錫公的領導與指導下，開始從事教育工作。那年我正滿三十歲。

錫公風範十例顯現

在中山大學追隨李錫公的歲月，是我一生中最高貴的工作與學習之旅

。四年當中，我幾乎每周都有機會與他見面，請益許多為人處事的道理。由於家岳的關係，李錫公一直對我格外親切與照顧。與他相處，就如同與自家長輩在一起的感覺，幾可無事不談、無話不說。特別是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為人中正平和，正派無邪，加上思慮慎密，條理分明，確有《望之儼然，即之也溫》，予人如沐春風之感。每次與他談話，都使我有許多收穫。而聽他談論問題，分析事理，基本上就是一種享受，從不會感到枯燥乏味或言之無物。這實植因於他豐富的人生經驗與長期追隨蔣經國先生，身負黨國重任的人生歷練有關。以此觀之，我是何等幸運，能在而立之年，服務社會之初，能遇到這麼一位《超級長官》，傳授我許多人生祕笈與寶典。這也是我初出茅廬、一邊工作、一邊學習的重要階段。

在此，我特別記錄以下十個事例，以證明李錫公通情達理、周到開明

的治世之道，非常值得大家（尤其是青年）學習與效法。

一、中山大學創校伊始，各項硬體建設才剛起步，帶給全校師生許多不便。記得第一年上課，四個系與兩個研究所全擠在一棟原已廢棄不用的小學老舊校舍中。一共不過七、八間教室，十分簡陋。為了彌補硬體設施嚴重不足的缺失，李錫公只有要求全體師長們務必認真教學，重視學生的意見，希冀以強化軟體服務，平息學生對校園環境不滿的情緒。他自己總是以身作則，在校的時候，他摒除應酬，到學生餐廳與學生一起排隊用餐，聽取學生對學校校務的意見，並一一記錄，交有關部門立刻改善。他十分重視校園的安全與環境的清潔衛生，經常半夜還到學生宿舍巡視，關懷他們生活學習的情形；他也經常在校園中走動，每次雙手都揀滿了紙屑，他從不以為意，也不認為如此做有失大學校長的身分。他提出學校校務工

作要做到《事事有人管、時時有人管、處處有人管》的高見，可說提綱挈領的抓到了學校行政的重點，值得所有學校的效法。受到他這種務實辦學精神的感召，我自是振作精神，將全付心力，都放在學生身上，甚至放棄學校為教授準備的宿舍不住，自願搬進學生宿舍與同學們住在一起，以便就近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如今回想起來，確實回味无穷。那時的中山大學，上上下下都充滿了朝氣，全校師生每日都精神抖擻的在並不理想的環境中認真的教學與學習，為日後學校的發展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二、中山大學成立的第一年耶誕節，學生要求在西子灣海灘上的《蓮海樓》開舞會，並邀請李錫公以校長身分到場開舞。那時還是臺灣教育界的《戒嚴時期》，教育部原則禁止學生在校內開舞會。為此，李錫公經過一番思考，把我找到校長室，告訴我這件事，然後說：「雖然教育部禁止

學生校內開舞會，可是我想如果學校不准學生在校內跳舞，學生就會到校外找地方開舞會。如因而發生事故，怎麼對得起家長？所以我經過考慮，同意他們在學校開舞會。」我聽了不禁為李錫公的開明作風叫好，自然也為他捏一把冷汗。因為若是別有用心的好事之徒，到教育部告一狀，對當時處於事業低潮的李錫公總是不利。可是，我知道他從不會以個人利害為考量問題的標準。在他的心中，學生的利益永遠是排在第一位。在這樣的考量下，他同意了學生開舞會的要求。不過，他接著說：「學生邀請我為舞會開舞，如果我接受，就表示學校是鼓勵，提倡學生跳舞，這就不好。所以，我決定婉拒他們的邀請。但是，我要你代表我去開舞。因為，你年輕，又剛從美國回來，能夠與學生打成一片，你去代表學校參加舞會，是最合適的人選。」

以今日社會開放的程度來看，或

許大家已很難想像校園舞會的嚴重性。然而，在那個時代，能夠如此周延處理學生事務的大學校長，除李錫公外，絕無第二人。而在我告辭離開前，他還特別叮嚀我：「記得要把太太從臺北接來一起開舞喔！」由此更能清晰的看出他性格細緻與人性化的一面。

三、一九八一年三月初，我應時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宋時選邀請，前往台中省黨部總理紀念月會講演。我於前一晚八時許，到臺北公路西站準備搭車赴台中。就在步入車站時，我竟然看到李錫公，他手提著中山大學的招生資料，也正準備搭公路局的班車到台中，以便第二天一早到台中女中為學校做招生宣導。我當時簡直不敢相信，這位三年多前，還是權傾一時的中央要員，又是現任國立大學校長，為學校做招生宣導是純粹的公務，大可坐校長座車到台中，不必辛苦的自己拎資料、趕公車。可是，李錫公不這麼想，他告訴

我，因為次日晨八點，就要到台中女中的週會上作報告，所以他必須前一晚趕到。坐校長座車，要勞動司機，影響別人的正常生活，沒有必要，不如一個人走。這就是李錫公，永遠是為別人著想。他確是身體力行了蔣經國平實、平淡、平凡的精神與作風，令人感佩。他也是第一位到中學校園做招生宣導的大學校長。正由於他做事認真，贏得輿論界給他「做什麼像什麼」的高度評價，也才使得中山大學在成立的第一年，就獲得社會熱烈的回響，絕非倖至，乃是李錫公默默耕耘與付出的結果。

四、中山大學成立之初，學校經費並非寬裕。尤其，學校事務費是根據學生人數編列，學生少，事務費更是明顯不足。在這種情形下，教授研究室都因缺乏經費，不能安裝冷氣機。在高雄經常三十五、六度高溫的炎熱氣候下，大家實在「苦不堪言」。此外，教授們常因教學研究需要，必

須撰寫論文與講義，但是各系所辦公室卻均缺乏英文電動打字機（那時尚無個人電腦）與影印機，可資使用，造成諸多不便，影響工作情緒。為此，我特別向李錫公反映，提出學校應為教授研究室加裝冷氣機，各系所辦公室至少應配備一台英文電動打字機與一台影印機的請求。李錫公在聆聽

了為什麼要為教授們加裝「三機」的分析後，覺得確有道理，立刻指示總務處照辦，所需經費，由他負責解決。從此，教授們從事教學研究工作也具備了充分條件。這雖看似一件小事，可是在教育經費十分拮据的年代，能考慮到教授需要，能為教授改善教學研究環境的學校，中山大學可能是當時的《唯一》。由此，亦可看出李錫公從善如流的開闊胸襟與雅量。

五、有次在從臺北回高雄的飛機上，又巧遇李錫公，因此下機後，就與他同車回到西子灣校園。記得當日同行的還有化學系主任陳國美教授。

在車上談起中山大學隨著近年的發展，學校規模日益擴大，已有許多從國外回來任教的年輕教授。可是缺乏彼此聯誼交往的機會，互不認識，走在校園，形同陌路，以致開展跨系所教學研究合作專案，十分不易。為了彌補這樣的缺失，我就舉出美國大學校園內多有《教授俱樂部》(FACULTY CLUB)的組織，經常舉辦活動，增進教授之間情誼，建議中山大學應可成立臺灣大學校園中的第一個「教師聯誼會」。李錫公聽了頻頻點頭，覺得很有道理。當即指示我草擬一份章程，積極籌備成立事宜。過了不到一個月，「中山大學教師聯誼會」就在他的主持下，宣告成立。由他擔任會長，指派我為第一任的總幹事，負責推動會務。日後證明「教師聯誼會」發揮了預期的功能，對增進教授們之間的情誼與合作，產生了相當效果。

六、「教師聯誼會」成立不久，

每次活動，許多教授夫人都以眷屬身分與會。這些教授夫人過去都曾長年旅居海外，擁有十分豐富的人生經驗與見識。如能結合她們的力量，協助推展校務或參與學生輔導工作，將會是十分有意義的事。因此，李錫公又在校園中組織了「教師眷屬聯誼會」，指派內子為第一任會長，並在中山大學校園內，仿照當年他在救國團成立「張老師辦公室」，從事青年輔導工作極為成功的案例，設立「張師母學生輔導中心」，由「教師眷屬聯誼會」教授夫人們接受培訓後，負責這項工作。此舉不但是臺灣大學校園第一個教師眷屬組織，也首創教師眷屬參與校務工作的先例，充實了學校輔導工作的陣容，對學校自有許多的幫助，後來也屢獲教育部的嘉獎肯定，甚至有許多其他學校專程前來考察，紛紛比照成立類似的機構。

七、李錫公的教育思想，深受中西文化精華的影響。他不只一次的告

訴我：「小學教育應該以生活教育為主，使學生知道作為一個現代國民生活上應有的規範與禮儀；中學教育則應以傳授作為一個現代國民應具有的基本常識與觀念為主要的目標；大學以上的教育才應以傳授專業的知識與研究高深的學術作為重點。」

正因為李錫公的耳提面命，使我這個非教育專業出身的教育工作者，能逐漸領會教育的精髓，並學著像他一樣，凡事都從學生的角度考量問題，將學生的利益永遠排在第一位。這樣的濡沐，對我日後擔任校長，主持校務有很大的助益。而李錫公上述有關各級學校教育目標的看法，在他接任教育部長後的第三天，我特別撰就「教育要從教做人做起」的專文，在一九八四年六月三日的臺北《民生報》上發表，公開向社會介紹與闡述這位新任教育部長的教育理念，也做為我向李錫公升任新職表示衷心祝福與道賀的一番心意。

八、有次與李錫公談話，他感慨的指出東西文化存在本質上的差異：「西方文化崇拜英雄，你只要有一個優點，縱使有九十九個缺點，也沒有關係；然而，東方文化求全，你有九十九個優點，只有一個缺點，都要受到社會的苛求。」

我想他之所以有此深刻領悟，或許與他長期從政的經驗有關。看多了政界人事起伏，深體人情冷暖現實的一面，難免有此感歎。此外，李錫公也提到早年在救國團服務時，蔣經國曾特別親筆書寫《隱藏》兩個字給他，希望他格外注意，不要《鋒芒外露》，以免遭忌。從他說的道理中，使我覺得人生在世，凡事必需謹慎，不能輕易放縱自己情緒，落人以口實，否則一切的努力，都會付諸流水。

九、李錫公曾告訴我，他每天晚上都要在過了一、兩點鐘以後，才能就寢。並非處理公文，而是每晚都必須親筆回覆一些來信。他說：「給我

寫信的人很多，自然不可能每封來信，我都親自回覆。可是，一些老同學或老朋友，還有家長、學生給我寫信，若是交由祕書代筆回信，他們收到信後，會認為是不是我的官大，擺出官腔官調的樣子，感覺很不好，甚至私底下會批評我。所以，這些必須親自處理的信件，都利用晚上看完公文後，花上一、兩個小時寫信，以致都要到一、兩點鐘才能休息。」

從這段談話，就可看出李錫公做人的周到與謙虛謹慎的處世風格。在中國官場上，像他做到如此高位，卻還如此勤於寫信的領導人，可說是《稀有動物》。即我自己為例，在過去二十餘年，李錫公就曾親筆給我寫了二十五封信，我都珍藏在個人檔案簿中，視為最有保存價值的重要資料。其實寫信固是小事，可是從寫信的小事中，所隱含人生大道理，又有幾人能參透？當今官場上，但見雞犬升天、趾高氣揚的小人，已少有人懂這

個道理。受到李錫公這番話的啟發，我也從此養成寫信的習慣，對親人、同學、好友、學生、家長的來信與來電，縱使自己再忙，都必親自回覆，絕不假手他人。

十、一九八三年下半年，內子因懷孕待產，在美居留了近半年之久。這段時間，我暫時恢復了單身身分。那時正值三十出頭，又是全國最年輕的大學研究所所長，難免引人注目。為此，李錫公多次關心的詢問內子的歸期，希望她能早日回來。

「年輕夫妻，長期分居兩地，總是不好。我倒不是怕你變心，只是擔心有些女人會主動找你。」

短短幾句話，道盡他身為長輩與長官對我生活的關注。促使我加倍警惕自己的行為，方不致辜負他的一番苦口婆心。從這件事上，我深入體會到李錫公人性的一面。他雖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但是絕非食古不化，也絕不道貌岸然。相反的，在許多事上

，他都能放下身段，與大家打成一片，展現他的人性化與人情味，使周遭的人感受到他輻射出的溫暖，十分特別。

以上十例，僅就我個人在中山大學時期，工作與生活上，受教於李錫公的諸多事例中，擇其影響特別大與印象特別深者，加以整理記錄而成。從以上十例，可以知道李錫公所擁有非常人所能企及的個人特質。他的成功不是偶然，是植基於他長年累積的豐富學養與見識之上。

擔任教長見解獨到

李錫公踏實的在遠離臺北的西子灣海邊，為甫升格為直轄市的高雄，打造了一座培育英才的高等學府。他的表現得到各界一致的肯定。蔣經國先生對這位得意門生的作為，自是「點滴在心頭」，一九八四年五月，蔣經國連任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內閣依慣例改組，由長期負責財經工作的

俞國華擔任行政院長。蔣經國親自交代俞院長，教育部部長由李煥出任。就這樣，李錫公得以重返臺北政壇，這是當年臺北政界的大事。

李錫公擔任教育部長不久，先發表我為教育部兼任科技顧問，負責國家高科技人才培育工作，使我得以參與中央機關的行政事務。接著又把我找到教育部，告訴我教育部內有兩個職缺，他覺得很適合我的專長。一是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司長，另一

是國立高雄工業專科學校校長。他要我考慮從中擇一擔任。我知道這是我對我的厚愛，甚至不顧可能招致外界任用私人的非議，不次拔擢的美意。經與先父商量後，決定接受出任國立高雄工業專科學校校長。這項人事案，經報奉俞院長核定後，由教育部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正式發佈。

由於我時年不過三十四歲，就出任國立大專學校校長，開了臺灣教育史上的先例，難免引起外界議論。當

時的黨外政論雜誌就曾大篇幅的報導，以《李煥人馬大進擊》聳人聽聞的大標題，指出李煥復出不久，就大量進用自己人，出任要職。並以我為例，稱我是李煥的《愛將》，才能以《幼齡》出任國立大專校長。語多嘲諷，大有看笑話的惡意成分。看到這些中傷報導，我雖嗤之以鼻，卻無形中對自己有著更嚴格的要求。我立志以辦學的成績，證明我的能力，也證明李錫公沒有用錯人。

或許出於對我一貫的愛護之忱，就在我就任校長三個月後的一九八五年四月四日，李錫公以教育部長之尊，到高雄工專視察校務。由於是日正值學生宿舍舉辦當月的慶生會，我知道李錫公最喜歡與學生在一起，故特安排他到學生餐廳，與數百位住校同學一起慶生。那天他的興致頗高，看到學校安排的行程有條不紊，環境也井然有序，知道我已能掌握學校工作的重點，外界的議論已不足懼。因此

，他即席向學生發表了一篇言情並茂的精彩講話，認為我們雖是一所工業專科學校，可是必需同時注重人文精神的教育。他特別指出那時在臺灣社會已開始燃燒的那把《野火》，公開反對中國傳統的《尊師》與《孝道》，是令人痛心的似是而非的謬論。他希望同學們要能明是非、辨善惡、知生死、通禮義，才能成為國家的中流砥柱與真正的人才。這篇有原則、有立場、是非分明的講話，令人聞之精神振奮。事後我將此講話內容加以整理，冠以「發展以人文主義為導向的科技教育」講題，印在校刊上，做為全校師生一體遵行的辦學目標與方向。

這就是李錫公令人折服的地方。追隨他做事，方向與目標永遠是明確的。在他擔任教育部長的三年一個月中，臺灣教育界難得的展現了空前團結和諧的氣氛。李錫公齊一了大家的理念，凝聚了大家的意志，集中了大

家的力量，為一向保守的臺灣教育事業，帶來了開明作風，注入了新的生機。其實，那時的大學校園，已是暗潮洶湧。隨著政治反對力量的日益公開化，學生運動與地下刊物，也正蓄勢待發。可是，由於李錫公個人的聲望與言之成理的見解，往往使反對運動者陷於瞠目結舌、難以強辯的窘境，只得知難而退。我記得那時李錫公

以《校園倫理》來規範《校園民主》的一番講話，指出「倫理精神」是教育的基礎，學校校園中的師生之間，存在的是一「倫理關係」。所以，學生在校期間，一切的活動，師長基於為師的責任，應予以適當的輔導，而不宜採取完全放任的《民主》。因為學生到學校求學的目的，就是要多受教育、多學習。過於自由放任的民主，不但失去了教育的意義與功能，受害最深的也必然是學生。因此，必須審慎釐清《教育》與《民主》的觀念與分際。如此擲地有聲，義正詞嚴的答

覆，使本來質詢時咄咄逼人的反對派立法委員，頓時不知如何回應，落得自討沒趣、草草結束的下場。

此外，李錫公教育部長任內，還順利完成了將師範專科學校一律改制升格為師範學院，提升了臺灣國民教育師資水準。又積極規劃推動以延長國民教育十二年為主軸的教育改革，希冀在臺灣邁入新世紀之前，透過十二年國民教育的實施與教材分級、教學創新、聯考制度的改進等教育改革配套措施，達到提升國民素質，解決升學問題，並將臺灣的教育，真正帶入《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的境界，貫徹實現教育最終的理想。只是非常可惜，李錫公離開教育部後，他的繼任者無一能及他的魄力與遠見。尤其在面對輿論質疑與立法委員不當壓力時，只知選擇迴避、妥協，而非據理力爭。以致臺灣教育界陷於價值觀念混淆、是非善惡不分的自甘墮落中，群龍無首，政策反覆，一夕數變

。這是臺灣教育界的悲哀，也是當政者用人不當的惡果。不論這是權鬥或是政爭，但是最終吞下苦果的，卻是最沒有反抗能力的子孫後代。如今快要過去二十年了，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的理想，竟仍然如此遙遠。李錫公每提及此事，均會難掩心中的失望、遺憾與痛心，並自責的說：「只怪我太早離開教育部，要是能多待上二、三年，十二年國教應可順利實施，臺灣教育將會呈現嶄新的面貌，造福全體學生，是多有意義的一件事！」

身處頂峯有志難伸

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蔣經國在他生命最後半年的關鍵時刻，任命李錫公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當這項重要黨政人事調動消息見報後，臺北新聞界一致指出：「經國先生終於打出了手上最後一張王牌。」就在這僅餘的半年中，李錫公襄佐經國先生，完成了解除戒嚴、開放黨

禁與報禁、允許臺灣人民前往大陸探親的重要決策，為臺灣今日的民主化與兩岸關係的發展，奠下了不可缺少的基础。

李登輝繼任總統與國民黨主席後的臺灣政局，已悄悄的展開了《質變》。李錫公一貫內斂與沈穩的行事風格，已不能滿足李登輝用人的需要。其間，雖有一九八八年七月七日，中國國民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李錫公在開會典禮上，以祕書長身分所做氣勢磅礴的「黨務工作報告」，使其一舉奪下中央委員選舉的最高票；次年六月一日又以極高票得到立法院的同意，出任行政院長，將個人政治生命帶入第二個高峰。然而，《道不同，不相為謀》，李錫公與李登輝出身背景與從政理念的巨大歧異，終難長久共事。事實上，李錫公擔任行政院長不久，即從一些政務的處理上，發現李登輝不遵循憲政體制，不依法行事，但憑個人好惡，專斷橫

行，並不當干擾行政院職權與決策等諸多令人憂慮的現象。這在蔣經國時代，是絕不可能發生的狀況。而在如何處置「彭明敏返台事件」上，更赤裸裸的暴露了李登輝罔顧法律尊嚴，一意孤行要求行政院去遷就一位「台獨通緝犯」的非法企圖。李錫公自是不以為然，不能接受、更不可能曲意迎合，兩人之間的矛盾乃日趨尖銳。李錫公至此，深知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已難有作為；又為了顧全大局，不願主動公開真象，以免導致政局動蕩，社會不安，更絕非他所願見。終於，在歷經一九九〇年二月因第八任總統選舉提名，導致黨內「主流」、「非主流」路線之爭後，李錫公選擇急流勇退，回歸平淡。平心而論，在政壇歷經數十年的風浪起伏，這樣的結果，對所有的政治人物而言，都是遲早要面臨的命運。可是對於瞭解李錫公內涵與才華的人來說，仍難免一時不我予，有志難伸」之歎。

永遠的長者與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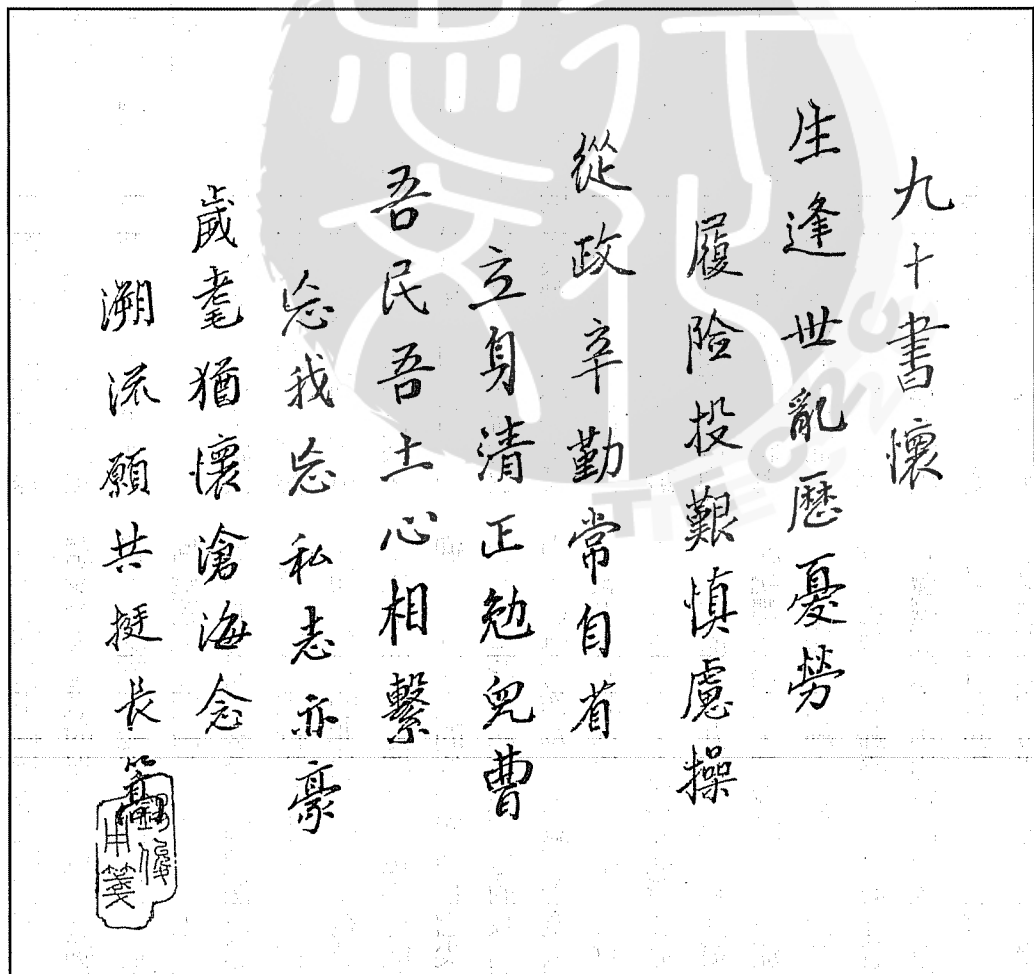
退出政壇的李錫公，實是國家一座珍貴的寶藏。在他近五十年服務公職的生涯中，所累積的豐富閱歷，真是挖之不盡、學之不完的知识寶庫。近年來，我每次回台，都必定去看望這位依然健朗可敬的長輩與長官，向他請教人生哲理，閒聊一些當年鮮為人知的《內幕秘辛》，並從中學習許多寶貴的經驗。就像二十多年前在中山大學時一樣，每次與他談話，總是那麼令人振奮，告辭時也都如此依依不捨。

這就是我心目中的李錫公，一位永遠的長者與智者。在我過去的生命中，他曾照亮了我的生命、充實了我的生命，今後還要繼續發光發亮，照亮與充實那些知道重視他這個知識寶庫的每一個人。

值此李錫公九秩大壽前夕，我要誠摯的向他老人家拜壽，祝願他老人

家：「隨心所願，福壽無疆，澤被兩岸，名揚四方」謹向這位「永遠的李錫公」致上最高的敬意！

二〇〇六年六月廿日於上海



前行政院長李煥親書「九十書懷」。